

金
D 金 丝 带 丛 书 · 世 界 名 著 译 丛

陪 衬 人

(法) 左 拉 著

刘 恒 永 译



华 文 出 版 社
Sinoculture Press

左拉中短篇小说选

音寸人

(法) 左拉 著

刘恒永 译



华文出版社
Sinquegrai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陪衬人/(法)左拉(Zola, E.)著;刘恒永译. - 2版. - 北京:华文出版社, 1998.1

(金丝带丛书)

ISBN 7-5075-0683-5

I.陪... II.①左... ②刘... III.①中篇小说-法国-近代-选集 ②短篇小说-法国-近代-选集 IV.1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7)第24763号

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邮编 100800 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电话:(010) 66035914 (010) 83086663

网址: [http:// www.hwbs.com](http://www.hwbs.com)

电子信箱: webmaster@hwbs.com

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蓟县宏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32开本 11.25印张 245千字

1998年1月第2版 2003年1月第2次印刷

*

定价:16.00元

“使未来世纪获得丰收”的 作家左拉(代序)

方位津

二十世纪是人类知识激烈震荡的时期,新的学术思想争相涌现,新的批评方法不断展示。文学领域中人们不仅开始在未开垦的处女地上辛勤劳作,早已结出丰硕果实的沃土也到了再次深翻施肥的耕耘时期。当我们试图重新阅读和研究传统经典作家作品时,左拉便自然地为我们提供了这片一试身手的天地。百多年来,围绕着左拉的几十部作品和他不同凡响愤世嫉俗的举动,褒贬各持,众说不一,而为人与为文,恰恰是争论的焦点,也就成了我们重温左拉的最好课题。正如法国大作家法朗士在左拉葬礼上发表的公正看法:“我们崇敬他,他的卷帙浩繁的作品和伟大的行动给他的祖国和世界增添了荣誉。”

艰辛半生,逆境中滋长的平民意识

1840年4月,爱弥尔·左拉出生于巴黎平民区域一个工程师家庭。七岁丧父,失去生活来源,就开始与母亲相依为命,体味生活的艰辛。十二岁时,左拉进入爱柯斯管理严格的公立中

学,他那孤僻、不善交际的腼腆性格使他难以习惯这样的环境。那些暴发户的孩子嘲笑他的口音,对他的祖籍轻蔑歧视,他对那些有钱人家的子弟的恶作剧感到惊愕和气愤,但又毫无防范之力。于是,市郊的穷孩子和城里的纨绔子弟的冲突就不可避免了。记得一次那些歧视左拉的学生抓住他要打的时候,是未来的大画家塞尚见义勇为教训了他们。从此,文静、老实的左拉与易怒、粗鲁的塞尚结下了真挚的情谊。很多年后,左拉在作品中这样谈到塞尚:“在中学时,人们辱骂殴打我,是他挺身而出给我以保护,他把我从痛苦中拯救出来,他为我这个像贱民一样生活于屈辱之中的人伸出了友谊之手,并且保护着我。”不知是由于塞尚的友谊还是他的发奋;不知是由于意识到家境的贫困还是由于未来前途的召唤,逆境中的左拉学习成绩一直优秀,获得一等嘉奖,而且还表现出一种尚不被他人注意的文学才华。公立中学的清苦生活常常使他感到沉闷,而外界环境又往往激起这个孤独少年的种种幻想。1854年底,排列在穷困但有雄心的学生行列中的左拉获得了奖学金,他又一次表现出了浑身的锐气和思维的敏捷。他惟一的目的就是跻身于优秀人物之列,做一个平民出身的英雄。

十八岁时,他来到巴黎继续读高中,贫困把他置于无法掩饰的窘境,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忍耐巴黎资产阶级子弟对他的冷遇。他们蔑视嘲讽这个享受奖学金的穷学生,多少次他想找个地洞藏起来,一下课,他就急匆匆躲回家中,蜷缩在那陌生、冰冷的床上哭泣。此时的左拉处于青年人迷惘、失望以及对未来艰难和恐慌不安的厌倦中。他运气不佳,大学考试没有通过,左拉从此结束了学校生活。他曾经在海关做了几个月的办事员,但很快由于无法适应而离开了。这使左拉母子又失去了经济来源。

青年左拉骨瘦如柴,面有菜色,衣衫破旧。他经常一连几个小时游荡在塞纳河岸上,和流浪汉、捡破烂的、钓鱼的、乞丐甚至

夜游的人们混在一起,有时也独自一人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河里注入了制革厂的废水,散发着臭气,贫困几乎使左拉对周围的一切都麻木了。他经常和母亲在一起吃仅有几块马铃薯的晚餐。他们不停地搬家,越搬越穷,有时饥饿把他从沉思和梦想中拉回到现实,他不得不用三个苏去充饥,然后,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又回到那又脏又乱的窝里度日。忧郁袭击着他的灵魂,饥饿吞噬着他的肌体。左拉写到:“……无限的忧郁……对陌生人的隐隐约约的恐惧……我的消化系统被彻底打乱了,我感觉到肠胃沉重地往下坠……我的肚子和前途使我不安。”左拉的母亲不断做些粗活维持生活,左拉为母亲的不幸备受煎熬,为自己过着流浪汉一样的生活而感到无地自容。他经常像乞丐一样用睡觉来抵御寒冷,因为火炉里已有两年是空的了。有一天,在先贤祠广场,左拉把外衣也送进了当铺,他只穿着衬衣和背心跑着,一不小心滑进了路旁的排水沟,摔在冰冷刺骨的泥水里,他挣扎起来,伤心地哭了。逃回家里,他用毯子裹住自己,一连三四天不出屋子,饿了啃几口干面包,他真的成了“阿拉伯人”,成了贫穷和困苦的儿子。对左拉来说,那段岁月里上当铺比上饭店勤得多,经常是有的吃就吃一顿,没的吃就饿一顿。有时他用捕雀器在屋顶上捉些麻雀,用挂帘子的铁丝穿起来放在火上烧着吃。

一个偶然的机,左拉父亲的朋友给他谋到了一份职业,到阿晒特书局去将新作品捆绑成包。这差事虽然单调乏味,但左拉终于能混上一口饱饭吃了。经历了巨大的物质穷困之后,左拉开始爱上这份工作,同时他也在这里结识了泰纳、勒南等人。底层生活的磨难使左拉学会约束自己。也懂得了如何去争取机会让社会和名人承认自己。四年以后,左拉开始学做新闻记者,给报社写文章。渐渐地,在阿晒特书局,左拉变成了一个有力量的人物。从几年前的打包工人,变成了广告科的科长,每月的薪

金二百法郎,同时还给《小报》和《公共安全报》撰稿,总收入为五百法郎,足以赡养与他相依为命的寡母了,左拉的贫困终于结束了。

1870年5月左拉与麦丽小姐结婚,随后他担任巴黎《钟报》驻国民议会通讯记者职务,到了凡尔赛。巴黎公社起义后,左拉重返巴黎,销声匿迹地生活在蒙马特贫民区。

1872年,左拉与福楼拜、屠格涅夫、都德、爱德蒙·龚古尔相识并成了好友,成立了著名的五人聚餐会。当他的《小酒店》问世并获得一笔数目可观的稿费时,他为自己建造了梅塘别墅,这是一处巴黎郊外塞纳河畔波瓦西森林附近的风景优美的地方,从1880年到1902年左拉逝世,除其间逃亡英国大半年外,他都居于此处,在这里完成了几百万字的创作。著名的《梅塘之夜》短篇小说集也在这里酝酿完成。左拉去世后,梅塘别墅成为纪念左拉的固定场所。每年九十月间都有法国文艺界人士在这里举行左拉巡礼会,这个传统至今仍保持着。

1902年9月28日,左拉从梅塘避暑归来,住在巴黎布鲁赛尔街甲二十一号他的寓所,这天天气潮湿而阴冷,他生煤炉取暖,不慎烟囱发生了故障,夜间煤气中毒。第二天清早被人发觉时,救治已经来不及了。左拉因这意外事故而过早地离开人世,离开了千百万拥戴他的读者。几年以后,当事人承认,此事故是受人指使所为,人们有理由相信这是反动势力对左拉的又一次迫害。

左拉的平民意识随处可见,他经常登门拜访龚古尔,然而他们的思想却相距甚远,尤其在对平民百姓的态度上难以一致。爱德蒙·德·龚古尔自我标榜:“我是出于名门的文人,而平民百姓,或者说是下等人之所以对我还有吸引力,就是因为他们是一些尚未被发现的陌生人,正如旅行家到遥远的他乡所寻觅的异国情调一样!”这种高傲的态度激怒了左拉。他们之间的关

系因此产生了隔膜。左拉不能容忍龚古尔对平民百姓居高临下的态度,他把自己作为平民的一员而自立于社会,他不允许有人在他面前摆贵族的臭架子、优越感,他认为这是对平民阶层的侮辱,他自觉地站在了维护平民尊严一边。

以社会下层人为荣,以为社会下层人而言的平民意识,是左拉一贯的秉性。左拉无论幼时的情趣和交友,还是成年以后的谋生择业,以至于成了大作家,他都没有忘记自己所处的社会阶层。他从不掩饰自己经历过的清贫和饥饿,也从不以吃尽底层劳动人民之苦为耻。他总是坦然地回忆当年的磨难,与母亲一起度过的艰辛。也总是自然而然地在作品中流露出对早年生活景况的回忆,以重温平民青年成材的坎坷。“对于苦难,我并未言过其实。当时深入生活的时候,我的穷酸相也是十分可怜的,以致孩子们围着我起哄,不肯让我走过去。”(为《小酒店》申诉)这种毫不虚荣的正视,特别是多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对底层人民的同情、理解和关注,正是左拉平民意识的体现。他已责无旁贷地把自己视为平民作家而乐此不疲地为广大平民读者创作。这大概也正是他的作品能获得最广泛的平民读者群并历经几百年而经久不衰的主要原因吧。

仗义执言,勇于维护真理

左拉是个脾气温顺、随和平易的人,几十年磨难使他学会了与各种人打交道,也爱与各种人交朋友。他心地高尚,善解人意,从不强加于人。因此成名之后在法国文人圈中人缘极好,颇有佳评。然而,这种秉性只是在正常情况下得以充分展现,一旦社会上出现以强欺弱的的不义行为或施展阴谋的诡计,无论是对自己、对朋友、毫不相识的人,他都会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大胆

发表自己的意见,与不合理现象公开宣战,表现出义无反顾的锐气、血气和坦荡的心胸。

早在青年时期,左拉好不容易争取到为一家报纸撰写专栏文章的差事。出于对绘画艺术的爱好,他决定写一组画家评论,但立刻就发现美术界存在着严重的偏见,许多有为的青年画家特别是现实主义流派的画家被拒绝于艺术展览会之外。左拉毫不犹豫地投入到这场争论之中,他以愤怒的情绪连续写了几篇文章,在文章中,他呼吁重新举办被拒绝者画展。批判的矛头直指艺术展览会那些平庸的画家,他还很热情地肯定了马耐等新派画家:“直截了当地讲,今年的评审委员会是带着偏见进行工作的……我问心无愧地承认,我欣赏马耐先生的画……”他认为,那些貌似权威的评审委员们把整个现实主义流派的画家都拒之门外,如塞尚、吉耶梅、马耐等等,实在是太愚蠢了,就连学院派的画家们也不得不承认这样做过于严酷了。左拉还亲自动手帮助塞尚写他的申诉信:“我无法接受同行们对我的作品所作出的不公正的裁判……我要求公众给予评论,并且要求展出,这展出必须向所有的严肃的劳动者们开放。”艺术研究院的总监以“公共秩序方面的原因”为借口,仍然坚持不能重新开放被拒绝者画展的决定,左拉对此做出迅速而强烈的反击:“那些肢解艺术的人,提供给广大观众的展品只能是缺胳膊少腿的僵尸。”他的耿直的天性在支配着他:“我要大声疾呼,毫无疑问,我将使某些人物大为扫兴,而且已经决心道出严酷的事实真相;而我,因为宣泄了郁结在心头的愤怒而感到一种由衷的欢悦。”这场维护年轻画家的论战在左拉的《艺术评论家的告别》中又一次证实了他的为人:“我将永远站在弱者一边。在芸芸众生和不驯服的有个性的人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斗争,我拥护那些有个性的人,而去和那些平庸之辈进行抗争……”,“我之所以成了传播邪说、亵渎神明的罪人,因为谎言和平庸使我厌倦,我

要在阉人中寻找有血气的人……这就是我被谴责的原因所在。”

左拉几乎在每一次争辩中都表现出激烈的情绪,这种站在弱者一边与当权者抗争的立场,这种不顾一切后果的勇敢精神,都远远超出了他以往留给人们的印象。那个本分的、忙于生存而不错过任何机会发展自己的左拉被激扬文字、仗义执言的左拉所代替了。这其中的思想根源不能不从他多年磨难中形成的对腐败的第二帝国的仇恨和对所有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人们的同情中找到答案。在《我的仇恨》一书中,左拉谈到自己:“仇恨,就是爱,就是火热,而且能触摸到善良的心灵,就是在仇恨丑恶和愚蠢的事物中宽心地生活……每当我因自己生活平淡而反抗时,就觉得自己更加年轻,也更加勇敢了”。左拉这种嫉恶如仇的性格,在晚年的德莱福斯事件中更为强烈地表现了出来。

1894年左右,犹太血统的法国军官德莱福斯被诬告向德国人出卖军事机密而被判刑。实际上德莱福斯与此案毫无干系,出卖军事机密的勾当恰恰是参谋部一军官所为。而法国军官中的保王党、天主教徒和反犹太分子,想乘机排斥军队中的犹太人,便断定犯罪人是德莱福斯,将他送上了被告席并被判剥夺军职,当众受辱。1895年左拉初次听说此事时,就感到其中有疑,直到1897年,他才接触到有关材料,并掌握了许多事实。左拉发现右翼势力在背后作梗,毅然投入了战斗。案件本身并不复杂,但由于它暴露了反动势力的邪恶用心,又有社会进步人士揭穿了这个阴谋,因而形成了正义与非正义两大阵营的斗争,使整个法国掀起了轩然大波。许多善良正直的知识分子,如若来士、法郎士等都因替德莱福斯抱不平而被称为“德莱福斯派”,左拉是这一派的骨干分子。他奔走呼号,不遗余力,以政论家的激情,气势磅礴的文笔发表了一系列轰动一时的文章。他尖锐地揭穿了资产阶级玩弄的所谓“爱国主义”概念。1898年1月13

日他在法国《震旦报》上发表了给共和国总统的一封信《我控诉》，在这封长信的末尾，他一连发出八个有力的“我控诉”，彻底揭露了当局和军方弄虚作假、践踏公理的丑恶面目。《我控诉》是正义的号角，是使反动势力大惊失色的宣言，他们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控告了左拉。军阀、教徒和资产阶级早已对左拉恨之入骨，因为左拉在许多作品中都暴露了法国军官的低能、教会的黑暗和资产阶级的堕落。左拉被迫上了法庭，反动报纸诬蔑他，打手们恐吓他，有些将军甚至咬牙切齿地说：“如不惩办左拉，法国军队要垮台。”种种迫害并没有吓倒左拉，有人形容他从法庭出来穿过那些准备袭击他的无数手杖时，简直和一个检阅仪仗队的国王一样庄严而镇静。他绝不收回他对法官说的话：“我发誓，德莱福斯是无罪的，我用我的生命担保，我用我的名誉担保，他是无罪的……”，“至于我所控告的那些人，我并不认识他们，也从未见过他们，我对他们既无冤也无仇。在我看来，他们只是社会不平等的制造者和代表，我的行动是一种革命手段，目的是在于使真相和正义早日大白于世。”左拉因此而被判一年徒刑和三千法郎罚款。他不得不逃亡到英国。流亡期间，左拉开始写作《四福音书》，其中第三部《真理》写的就是德莱福斯事件，小说得出了真理必然胜利的结论。左拉脍炙人口的名言是“真理在前进，什么也不能阻挡它。”可惜左拉没有看到德来福斯事件的最后结局，德莱福斯是在左拉去世四年之后才被宣布恢复名誉的。然而，“他的行动所引起的深远影响是难以估量的，这种影响在今天正以强大的力量和崇高的威严起着作用，并将永远起着作用……让我们告之九泉之下的英灵：他的不幸的遭遇和他的纯洁的心灵，使他有一个伟大的晚节，他最终成了人类良知的代表（法朗士）！”左拉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为正义而斗争是一贯的。他的光荣将永留青史。

大胆探索,勇于革新的文学观念

纵观左拉六十二年坎坷生活,他的世界观除了在学术理论方面受泰纳、孔德等人的影响外,当时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也促成了左拉思想的形成。

其一是1870年9月拿破仑第三的失败,第二帝国的垮台。出于进步的民主思想,左拉对拿破仑第三和他统治的第二帝国恨之入骨。他在《卢贡家族的家运》一书中热情赞颂了反对这个流氓皇帝的共和派英雄,他认为拿破仑第三的统治时期是“疯狂而可耻的奇特时代”。他热烈欢呼第二帝国的崩溃,认为这个胜利带来了他思想上的一大解放。

其二是巴黎公社起义对他的影响,无产阶级第一次暴力尝试的巴黎公社虽然只有七十二天的寿命,但是它启发了工人阶级的觉悟,传播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出了对资产阶级战斗的号角。这些进步潮流的涌动,促使左拉开始了对社会主义的研究。

其三是1871年第三共和国成立之后,复杂的法国社会现实对他的教育。

总的说来,左拉思想体系虽有对现实不满,不肯依附统治阶级,寄希望于人民,但也不主张革命。正如瞿秋白在《关于左拉》一文中指出的:他的思想应当是民权主义的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意识的代表。在文学观上,左拉则表现为敢于对传统创作大胆思考与挑战,勇敢地树起了自然主义的大旗,开始了他实验小说的尝试。

1868年,左拉在文艺理论与创作理论上进行了深入的钻研,他在接受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泰纳的文艺理论以及克洛德·贝尔纳的实验医学的基础上,从当时的生物学、医学、生理

学中得到借鉴与启发,在原来的现实主义基础上,形成了他自然主义的文艺思想体系,这种自然主义文学观表现在他的几部文艺论集之中。如《实验小说论》、《自然主义戏剧》、《我们的戏剧创作家》、《自然主义小说家》等。

关于左拉的自然主义文学观,历来是批评家研究和争执的目标。很长时期人们将自然主义归入庸俗、污秽、低级、消沉的文学之列。事实上,作为自然主义文学观的创始人和勇敢实践者的左拉,早已对这一文学流派的理论做过充分的论述并足以消除人们对自然主义的种种误解和偏见。

自然主义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对文学真实性的重视。“真实感是小说家的最高品格”,左拉一语中的地指出自然主义的本质。他说:“真实感就是如实地感受自然,如实地表现自然。”这里的自然,即是客观的现实。左拉认为,创作的基础首先是作者对现实生活的真切感受和深刻认识:“我们从真实的事实出发,这些事实是我们的不可摧毁的基础。”“使真实的人物在真实的环境里活动,给读者提供人类生活的一个片断,这便是自然主义小说的一切。”当左拉开宗明义地将自然主义与真实感紧密相连之时,也就把真实感作为衡量一部小说成功的关键。真实感“对我来说是决定我一切判断的试金石。当我读一本小说的时候,如果我觉得作者缺乏真实感,我便否定这作品,不论它是在阴沟里还是在星球上,在底层还是在上层。那对我们都一样,毫无区别。”左拉认为,许多作家的成功作品,皆因遵循了真实感的原则:“请看我们当代的伟大小说家吧,居斯塔夫·福楼拜、龚古尔兄弟、阿尔封斯·都德,他们的才华不在于他们有想像,而在于他们强有力地表现了自然。”“你要去描绘生活,首先就请如实地认识它,然后再传达出它的准确的印象。如果这印象离奇古怪,如果这幅图画没有立体感,如果这作品流于漫画的夸张,那么,不论它是雄伟的还是凡俗的,都不免是一部流产的

作品。注定要很快被人遗忘。”“它不是广泛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就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左拉这种对真实感的崇尚和反反复复的强调,正是对文学创作真实论精髓的准确把握,无疑与我们所遵循的创作原则是一脉相承的。

在强调真实感的同时,左拉的自然主义文学观并没有完全排斥和否定想像力在创作中的作用,只不过十分鲜明地指出如果你是小说家,而不仅是故事作家和幻想作品的作家,就应将想像放在次于真实感的地位。因为时代变了,条件变了。“我着重指出想像的衰落,因为我在想像的衰落里看到了当代小说的特征。”“以前对于一个小说家最美的赞词莫过于说‘他有想像’,在今天,这一赞词几乎成了一种贬斥了。这是因为小说的一切条件都变了。想像不再是小说家最主要的品质。”“如果小说还只是一种精神消遣,雅致而有兴味的娱乐,那么,人们必定认为小说的最高品质就是丰富的想像,甚至在历史小说和哲理小说产生后……仍然让想像在小说中处于统治地位。一到自然主义小说,也就是说一到观察和分析的小说,条件立刻就变了。”

自然主义文学观是左拉有意识、有目的创建起来的一种自觉的,标新立异的文学主张。创建这种理论的初衷至少有两原因:一个是左拉立志要成为一个划时代的作家,要在创作上与理论上具有自己的、不同于过去时代的大作家的东西,要对现实主义有新的发展与突破。另一个是由于左拉多年的社会阅历和生活积累,使他对社会与文学根本关系有了独特的见解与结论。他要把自己的理解融于全部作品中——即文学艺术离不开环境气候、风俗习惯、科技发展,必须表现时代的特征。

左拉自然主义理论的主体内涵有三个方面,首先,他把文学与自然科学结合的重要性强调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以至表现出要求文学从属于自然科学的倾向。他认为,“既然以往

作为一种技艺的医学现在构成了一门科学,文学为何就不能借助实验方法也成为一门科学呢?”“生物学家和医生继续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事业,我们要继续他们的事业。”“将来,当人们证明人体是一架机器,有朝一日可以按实验者的意愿拆卸和安装其齿轮系统时,科学便一定会转向人的感情和智力行为。那时,我们将进入迄今一直属于哲学和文学的新领域。”其次,左拉在自然主义理论中又把文学艺术本身规律的重要性降低到了从来未有过的限度。他认为自然科学所要求的只承认客观既成事实的实证精神和详尽占有资料对客观事实加以实录的严格态度,都必须体现在文学创作中。而艺术加工不必在创作中占重要地位,这样,艺术的典型化被忽略了,甚至情感也被限制了。这些主张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文学艺术创作的普遍方法与规律,使文学创作完全成了纯自然科学式的机械活动。再者,左拉在自然主义理论中过分强调把医学的遗传学引入文学,要求严格按照遗传学的观点去描写人。他说:“我认为遗传问题对于人的精神和感情行为有巨大的影响”,“依照生理学将给我们证明的那样,展示在遗传和周围环境影响下,人的精神行为和肉体行为的关系,然后表现生活在他所创造的社会环境中的人,他每天都在改变这种环境,他自身在其中也不断发生变化。”

从根本上说,左拉的自然主义理论仍然属写实主义,它继承了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的重要本质,是现实主义文艺思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即增加了自然科学的内容。出于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左拉的自然主义文学主张显然会流于偏颇与片面化。在观察人、描摹人的问题上过分强调生理性,必然会导致不良后果,它会分散作家对于人的社会属性的关注和研究,有碍作家对复杂的人的阶级性、民族性与人性做深层的挖掘,使作品掩盖了社会矛盾;它必然导致作品中充满对人的生理、动物性的描写,作家津津乐道地去描绘那

特定场景中令人厌恶的血肉之躯或恶臭熏天的肮脏场面,使文学留下败笔,丧失美感。

说到左拉的“实验小说”,我们似乎可以从另一角度去考察左拉对文学创作的追求。当时社会思潮丰富活跃,各种哲学观纷纷登台表演。而尤其展示其生命力和科学性的就是唯物主义和进化论、孔德的实证论、克贝尔纳洛德的实验医学和泰纳的艺术哲学。作为一个进步的资产阶级作家,一个把文学创作视为生命的自觉文人,左拉拼命吸收着时代的所有精神营养和思维食粮,甚至渴望将自然科学的大发展移植到文学创作中去,使其更加科学更加准确。于是他产生了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揭示人生生理奥秘的想法。去追寻人的自然本性的愿望;同时也就产生了“我们距离化学的确切性还很远,甚至距离生物学的确切性也还远,我们也不知道有什么试剂去分析感情,使感情成为可以分析的东西”的遐想。应该说,这是左拉对于科学引进文学创作的呼唤,是他重视科学在文学中价值的体现,也展现了左拉追求科学的执迷和超前意识。也许左拉这种一厢情愿的将科学研究方法引入文学创作并不可行,但正如人类若没有幻想就没有未来一样,儒勒·凡尔纳当年的许许多多科学幻想小说中的情节如今都已成了现实,科学发展是可以将整个世界改观的,我们能一口断定左拉的期盼在未来没有实现的可能吗?如今心理学上所用的各种仪器,精神病医院所做的各种实验、物理疗法,如测谎器、催眠术、记忆器以及高功能的机器人等等,不都是科学用之于人类本性探究的成果吗?从这点而言,左拉的实验小说的提法不仅不荒唐,反而更证明了他的思考的价值和超前意识的可贵。何况左拉当时提出运用科学方法去研究人,主要用来排除当时社会学、文学上那些“经验哲学家”“规条制造者”“理想的理论家”所制造的“抽象的人物”和“谎言式的发明”,只是希望人们能更加尊重科学对于人类的作用。应该承认,从社会

发展趋势和科学进步的角度,左拉是有道理的,法国教授乔治·布塞对左拉说过:“在科学领域里,在已知和未知之间,有一个广阔的地带,那是留给艺术的。”

现实主义创作技巧的独特贡献

在文学理论发展史上,左拉以自然主义、实验小说著称,而在实践中,他往往突破了自然主义理论的框框,他的作品抛弃甚至违反自然主义之处很多。他的主要文学成就不仅体现着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基本特征,还为这一思潮做出了独特的艺术贡献。首先,他是现实主义创作理论的自觉拥护者,左拉曾说:“在一部作品中,通过一个人物,通过一种气质,一种个性,我们看到作家的艺术创造。在这种新型的背景下产生出来的形象是对现实中的人物和事物的再创造,而这种再创造不可能是完全忠实的,它要随着在我们眼睛和大自然之间出现新的背景而变化多次……现实主义背景有如一只朴素无华的薄薄玻璃杯子,它应当是完全透明的,使得各种形象能透过它,并在完全真实的基础之上,再产生出新的背景……如果必须表态的话,我双手赞同这种现实主义的背景理论……”其次,左拉对现实主义大师们的恭敬也足以证明他对这一流派的追随。左拉钦佩巴尔扎克,对他的作品几乎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他经常赞叹巴尔扎克“这是何等伟大的人物!……他卓立于整个世纪之上。”左拉几乎与《人间喜剧》的作者朝夕相处,他反复重读他的作品,几乎成为巴尔扎克的研究学者。这种研究的结果,使左拉在哀叹自己因生在巴尔扎克和雨果之后而感到生不逢时的同时,也庆幸地发现了老巴尔扎克创作中的固疾以及留给自己的创作蹊径。“不能像巴尔扎克那样,注意力不能放在具体人物身上,而